

文化传统视域下中美学校道德教育模式差异与融合路径研究

陈慧

西南石油大学南充校区 四川南充 637001

DOI: 10.12238/jief.v7i7.15787

[摘要] 文化传统深刻塑造了中美学校道德教育的差异化路径和各自不同的学校道德教育模式。中国道德教育在个体价值培育上存在知行脱节, 美国存在多元文化方面的价值共识断裂, 而信息碎片化与技术伦理争议加剧了两国共性挑战, 通过“双向情境化”融合路径, 同时立足文化基因的守正与开放平衡, 构建兼具文化自觉与全球视野的德育生态。为破解全球化时代价值观教育困境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践参照, 对推动跨文化伦理共识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文化传统; 道德教育模式; 融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42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s and Integration Paths of Moral Education Models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Tradition

Chen Hui

Nanchong Campu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1

[Abstract] Cultural traditions have profoundly shaped the divergent developmental paths and distinct educational models of school mor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Chinese moral education face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cultivating individual values, its counterpart in the U.S. confronts fractures in multicultural value consensus. Compounded by information fragmentation and escalating debates over technological ethics, these shared challenges require a "two-way contextualization" integration approach. By balancing cultural preservation with openness rooted in cultural DNA, this framework establishes a moral education ecosystem that integrates cultural awareness with global vision. The study provides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addressing value education dilemmas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offering cruci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ross-cultural ethical consensus.

[Key words] cultural tradition; moral education model; integration path

引言:

道德教育作为塑造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力量, 关乎国家发展命脉与人类文明存续。中西方文化传统下, 中国与美国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存在显著差异, 却共同将学校道德教育视为培育合格公民、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作为东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 两国道德教育模式植根于各自文化土壤, 呈现出独特的理论与实践路径, 其异同对比对全球化时代的伦理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道德教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强调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 目标在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政府将道德教育纳入国家战略, 通过课程标准化、红色教育基地建设等方式, 强化意识形态引领。然而, 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过度依赖课堂灌输、内容政治化倾向明显、与生活实践脱节等问题, 导致学生主体性缺失与教育实效性不足。美国则受个人主义与多元文化影响, 道德教育历经 20 世纪社会动荡后, 转向认知发展理论(科尔伯格)、价

值澄清模式(拉斯)等实证路径,注重公民责任培养与道德判断力提升。其教育策略突出隐性渗透,通过社会活动、媒体资源与公共空间塑造“美国精神”,但自由化倾向也带来道德标准模糊、价值观碎片化等挑战。

数字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加剧道德教育的复杂性。网络信息在拓宽教育载体的同时,也引发伦理失范危机。中美均面临青少年网络沉迷、价值观冲击等问题:中国严格管控网络内容以抵御“精神污染”,美国则在信息自由与伦理责任间寻求平衡。这一背景凸显跨文化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通过剖析两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基因、内容设计、实施路径及评价体系,探索适应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需求的解决方案。

通过文献分析法系统梳理中美学校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差异,聚焦文化传统对教育目标、课程设置、师生角色及网络伦理的影响,旨在揭示双方优势与局限,为构建互补性教育模式提供依据。研究不仅有助于突破单一文化视角的局限性,更为应对多元价值冲突、提升道德教育实效性提供跨文化范式,对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共识具有深远意义。

1.中美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溯源

1.1 中国:集体主义伦理的延续与创新

中国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深植于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交融之中。儒家文化以“家国同构”为核心理念,构建起从家庭伦理延伸至国家治理的道德共同体。《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强调通过自我约束实现社会秩序的和谐,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式伦理逻辑。这种伦理范式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精准揭示了这种“推己及人”的伦理扩展机制,个体通过家庭伦理的实践,逐步将道德关怀投射至社会共同体。

进入现代,集体主义伦理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将传统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升华为无产阶级的集体使命,使道德教育从精英阶层的修身之学转变为大众化的政治实践。邓小平时代提出的“四有新人”培养目标,则将集体主义精神与现代化建设需求相结合。2012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更系统整合了传统伦理与现代政治话语,如“爱国”“敬业”等范畴既延续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精神,又赋予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内涵。这种“守正创新”的文化策略,使中国道德教育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主体性。

1.2 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实践嬗变

美国道德教育的文化基因源于清教伦理与启蒙思想的复杂共生。早期清教徒建立的“山巅之城”理想,将个人灵魂救

赎与共同体建设相统一,约翰·温斯罗普1630年的布道词《基督慈善的典范》奠定了“美国例外论”的宗教根基。《独立宣言》中“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宣告,则将个人权利神圣化,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观察到,这种个人主义“首先表现为对物质享乐的合理追求”,继而演变为民主社会的精神特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所倡导的“勤俭致富”伦理,完美诠释了清教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合。

20世纪后,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个人主义形成强烈冲击。赫希(E. D. Hirsch)提出的“文化素养”概念引发的教育大辩论,本质是“文化熔炉”理想与“沙拉碗”现实的冲突。加州2016年通过的《健康青年法案》(AB 329)要求公立学校开展LGBTQ+包容性教育,引发保守派强烈反对,这种争议折射出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永恒张力。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指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道德个人主义”向“表现型个人主义”的异化,传统基于共同善的道德共识逐渐被身份政治的“差异崇拜”消解。

1.3 文化冲突的现代映射

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深化催生了集体主义与个体价值的深刻张力。2021年网络流行的“躺平”现象,本质是青年群体对“996工作制”所代表的奉献伦理的消极抵抗。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数据显示,18-35岁群体中68%认为“个人生活质量优先于社会贡献”,这种价值取向的转变冲击着“螺丝钉精神”的传统德育范式。但政府通过“最美奋斗者”评选等国家叙事重塑,试图在个体诉求与集体利益间寻找新平衡。

美国社会则面临身份政治对道德共识的解构危机。“黑命贵”(BLM)运动引发的警民关系讨论,暴露出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的伦理悖论。2020年明尼苏达大学废除柏拉图著作必修课的决定,象征着西方经典人文传统与进步主义价值观的剧烈碰撞。政治哲学家福山警告,过度强调群体差异的“身份自由主义”正在侵蚀美国民主的根基。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国家缺乏共同价值观,这种道德共识的缺失直接反映在学校德育领域——得克萨斯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性教育纲要差异,折射出联邦制下价值整合的困境。

中美道德教育的文化溯源揭示出深层价值逻辑的差异:中国强调“关系伦理”下的责任共担,美国崇尚“权利伦理”中的个体自主。这种差异既是文化基因的历史选择,也是应对现代性挑战的实践方案。理解这种文化根性,有助于超越简单的优劣评判,在文明对话中探寻道德教育创新的可能路径。如杜维明所倡言的“精神人文主义”,或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的道德教育提供跨文化启示。

2.中美道德教育在目标、内容与方法的跨文化比较

2.1 目标设定: 社会服从与个体解放的文明分野

中美道德教育的根本差异, 首先体现为教育目标的哲学分野。中国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核心目标, 强调个体对集体意志的服从与社会秩序的维护。这一目标深受儒家“修齐治平”伦理传统影响, 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演化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机制。例如“学雷锋”活动从1963年延续至今, 已从朴素的助人行为升华为国家意识形态符号: 2023年教育部数据显示, 全国中小学年均开展学雷锋主题活动超120万场次, 其核心功能在于将个体道德实践纳入集体主义叙事框架。这种目标设定具有鲜明的层级性特征, 如《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明确将“爱党爱国”置于目标体系顶端, 形成“政治认同—社会公德—个人品质”的三级结构。

美国道德教育则以塑造“批判性公民”(Critical Citizen)为旨归, 其目标在于培养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道德主体。这种取向源于启蒙运动对理性精神的推崇, 在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实用主义哲学中得到强化。以“模拟联合国”(Model UN)为例, 该项目通过角色扮演引导学生处理国际争端, 其设计暗含科尔伯格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学生需在人权、环保等复杂议题中权衡多方利益, 2019年全美参与学生超20万人, 74%的教师认为其有效提升道德推理能力。这种目标设定强调道德判断的情境性与生成性, 如《共同核心州立标准》(CCSS)要求社会研究课程“培养质疑权威的批判思维”, 折射出个人主义文化对教育目标的深刻形塑。

2.2 内容载体: 显性规范与隐性渗透的路径差异

在内容设计层面, 中国采取显性规范主导的课程体系。国家统编教材《道德与法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象化为12个主题单元, 如八年级“维护国家利益”单元通过《长津湖》战役案例分析, 将国家安全意识与历史记忆建构相结合。这种显性教育具有强烈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2022年人教版教材修订新增“总体国家安全观”专章, 其内容占比从5.3%提升至11.7%, 体现意识形态教育的强化趋势。隐性渗透则通过仪式教育实现, 如每日升旗仪式中“国旗下讲话”环节, 将家国情怀转化为具身化实践。

美国则擅长运用隐性课程传递价值观。华盛顿大屠杀纪念馆的教育项目堪称典范: 通过幸存者证词视频、受害者物品陈列等沉浸式体验, 使参观者自然形成对种族主义的道德拒斥。研究显示, 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对人权议题的关注度提升42%, 且效果持续6个月以上。在社会议题融入方面, STEM课程中的伦理模块设计颇具创新性, 如麻省理工学院开发的“气候正义”教学包, 要求学生在构建碳排放模型时, 同时分析其对原住民社区的影响。这种跨学科整合策略, 使道德教育摆脱空洞说教,

转而嵌入真实问题解决过程。

2.3 实施路径: 权威传授与主体参与的方法论对峙

中国道德教育实施具有鲜明的权威传授特征。思想政治课普遍采用“灌输—考核”模式, 教师依据教育部制定的214个知识要点进行讲授, 并通过标准化测试检验记忆效果。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价值传递效率, 但其弊端在于抑制批判思维, 学生缺少自主分析道德困境的能力, 当哈佛大学桑德尔教授的“电车难题”作为公开课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德育教育还可以是这样的。

美国则推崇主体参与式教学法。“电车难题”辩论的课堂应用典型体现了这一特点: 教师通过虚构的伦理困境(如牺牲1人拯救5人的轨道切换选择), 引导学生经历“道德困惑—观点交锋—反思重构”的完整认知过程。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发现, 采用该方法的班级, 学生在道德判断测试中的得分标准差比传统班级低19%, 表明更易形成理性共识。服务学习(Service-Learning)作为另一重要路径, 将社区服务与学术课程结合, 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要求学生在流浪者救助实践中, 同步完成社会学理论论文, 实现道德认知与行为的协同发展。

2.4 评价体系: 政治导向与多元包容的价值博弈

中国道德评价具有显著的政治导向性。“优秀班干部”评选标准中, “政治觉悟”(占40%)与“集体贡献”(占35%)构成核心指标, 而“个人品德”仅占25%(教育部《中小学生综合评价指南》)。这种设计强化了道德表现的政治属性, 但也导致工具化倾向。近年来的教育改革尝试引入综合素质评价, 但在高考指挥棒影响下, 德育评价仍难以摆脱附属地位。

美国则采取质性评估策略。“公民素养档案袋”(Citizenship Portfolio)制度要求收录学生的社区服务记录、伦理困境反思日志等过程性材料, 其评估标准强调“责任意识”(30%)、“批判思维”(25%)等维度。纽约州实施该制度后, 学生参与志愿服务的平均时长提升27%(州教育厅2023年数据)。但这种多元包容取向也面临价值共识缺失带来的挑战。2019年关于得克萨斯州与加利福尼亚州的性教育课程评估争议就很好的说明了这点。2019年, 得克萨斯州通过《家长自主权法案(HB 1725)》, 要求学校性教育需强调婚前禁欲, 禁止教材提及避孕措施有效性; 而同期加利福尼亚州《健康青年法案》(AB 329)强制要求覆盖性少数族群(LGBTQ+)权益内容, 提供多样化避孕指导。

3. 共性挑战: 网络时代道德教育的双重困境

3.1 传统权威的解构: 道德话语权的技术性转移

数字技术重构了价值传递的权力格局, 中美传统道德权威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祛魅危机。在中国, 榜样教育的符号化叙事

面临解构风险。B站上《雷锋同志的一天》二次创作视频通过鬼畜剪辑，将“无私奉献”精神解构为“职场内卷”隐喻，播放量超500万次，评论区72%的留言呈现戏谑化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2023年调查显示，18-25岁群体对“雷锋精神”的情感认同度仅为41%，较2013年下降29个百分点。这种解构并非对道德价值的否定，而是青年群体借助技术赋权，对单向度灌输教育的反抗性表达。

美国则面临网红文化对教师角色的消解。TikTok挑战（如“走廊封锁”挑战）诱导学生模仿危险行为，教师劝阻时常遭遇“你无权干涉我的自由”的对抗。全美教育协会（NEA）调查表明，63%的教师认为自身道德权威被社交媒体削弱，缅因州某高中甚至出现学生依据网红言论质疑教材伦理立场的现象。技术赋权使青少年更易获取替代性价值资源，传统教育者的知识垄断地位被打破，道德话语权向算法推荐与网红意见领袖倾斜。

3.2 价值观的流动性危机：信息生态的伦理挑战

算法推荐机制催生的“信息茧房”，正在瓦解道德教育的认知基础。微信通过社交关系链构建的圈层化信息网络，使“饭圈文化”、“地域歧视”等亚文化群体形成封闭价值体系。清华大学2022年研究发现，青少年在抖音浏览同类内容5次后，算法推荐同质化视频概率达89%，导致道德判断趋向极端化。美国Facebook的极端群组推荐算法同样饱受诟病：参与“反疫苗”群组的用户，三天内收到同类内容推荐量增加340%，加剧科学伦理共识的撕裂。

虚拟身份的匿名性则诱发道德责任逃逸。斯坦福大学网络行为实验室实验显示，匿名状态下，中美被试在模拟网络暴力情境中选择攻击行为的比例分别达74%与68%，较实名环境提升41%与39%。知乎“挂人”帖与Twitter谩骂战的泛滥，揭示出赛博空间“去抑制效应”对道德自律的侵蚀。更严峻的是，元宇宙等新技术可能加剧此现象：Meta Horizon Worlds中虚拟性骚扰投诉量2023年同比激增220%，平台监管陷入伦理困境。

3.3 技术伦理的全球性困境

中美差异背后存在共性机制：技术资本主义逻辑正在重塑道德教育生态。平台经济的注意力争夺本质，迫使算法优先推送情绪化、冲突性内容。字节跳动内部数据显示，含道德争议话题视频的完播率比普通内容高53%，助推“审丑文化”蔓延。OpenAI的ChatGPT虽设置伦理过滤机制，但其回答仍可能强化文化偏见。这些挑战超越国界，要求跨国协作构建技术伦理框架。

网络时代道德教育面临的根本矛盾，在于技术赋权带来的价值多元化与教育者整合能力的结构性滞后。中美需超越差

异，在算法治理、数字公民教育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应对技术革命对人类道德生态的重构挑战。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所指出的，唯有建立“以人为本”的技术伦理准则，方能在数字文明时代守护人性的道德光辉。

4. 融合路径：双向情境化与本土化创新

4.1 中国模式的情境化重构：伦理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中国道德教育的创新需立足于儒家伦理的创造性转化，在守正与开新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儒家“礼”学强调“因时而变”的实践智慧，为传统价值的当代转译提供方法论启示。情境化重构的核心在于将抽象伦理原则嵌入具体生活实践，例如“孝”的现代诠释可从家庭赡养义务扩展至代际数字反哺，通过智能手机使用教学等场景，实现“敬”与“亲”的情感传递。这种转化遵循“体用不二”的哲学逻辑——以“仁”为体，以技术为用，避免陷入传统符号的空洞复刻。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在此具有跨文化启示：道德教育应突破课堂边界，通过“经验连续性”实现知行合一。中国近年推行的“大思政课”改革，通过红色基地实践、乡村振兴调研等场域化教学，将家国叙事与个体经验勾连，暗合具身认知理论（Embodied Cognition）的“情境—认知—行动”交互机制。这种路径既保留集体主义的精神内核，又赋予个体道德主体性生长的弹性空间。

4.2 美国模式的共识化调适：多元主义的价值整合

美国道德教育亟需在文化多元主义中重建价值共识，其关键在于重构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培育机制。罗尔斯“重叠共识”理论为化解价值碎片化提供框架：通过公民理性对话，在差异中探寻底线伦理的公约数。共识化调适的突破口在于重构公民教育的叙事语法：将自由主义的“权利优先”逻辑与社群主义的责任伦理相耦合。如在环境伦理教育中，既强调个人碳排放权的边界，也凸显代际正义的共同体责任，这种双重叙事可缓解自由至上主义导致的生态危机。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此提供操作路径：在学校创设“理想言谈情境”，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多元价值的平等对话。芝加哥公立学校推行的“争议议题审议工作坊”，要求学生在种族、移民等敏感话题中遵循“事实举证—逻辑推演—情感共鸣”的三阶对话规则，这种结构化讨论模式既尊重个体表达，又导向责任共担的伦理共识。

4.3 双向情境化的理论模型：跨文化伦理的生成逻辑

中美的互补性创新共同指向“双向情境化”的理论内核——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取决于文化传统与当下语境的解释学循环。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理论揭示：教育者需在传统“前见”与现实境遇的张力中，实现道德意义的再生产。中国“孝道”教育从家庭伦理向职场代际协作

的扩展,美国“自由”价值从消极权利向积极责任的转化,均体现传统范畴的创造性解释。

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进一步深化该模型:道德实践总是特定文化资本与惯习的产物。中国的“红色研学”将革命伦理转化为VR场景中的具身化体验,美国的“宪法情景剧”将历史文本转化为民主协商训练,二者共同遵循“文化资本—实践场域—身体惯习”的再生产逻辑。这种跨文化印证表明,有效的道德教育必须完成双重解码:既激活传统的符号能量,又回应现代性实践的需求。

4.4 本土化创新的实践向度

文化转译机制的建构:本土化创新的本质是文化符号的意义转码。中国可借鉴解释人类学的“厚描”方法,在德育教材中建立“经典文本—生活案例—价值追问”的阐释结构。例如《孟子》的“恻隐之心”可链接至社会服务中的志愿者行动,通过跨时空的意义勾连实现传统美德的当下确证。

技术伦理的文明对话:人工智能的伦理挑战为中美协作提供契机。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与杜威工具理性批判形成对话,可共同构建“技术—伦理—文化”的三维治理框架。例如在当下热门的算法偏见治理中,中国“恕道”的推己及人原则与美国程序正义理念的结合,可能催生更具包容性的技术伦理准则。

教师角色的范式转型:教育者需从“价值传递者”转向“文化转译者”。这要求师资培养融入文化解释学训练,使教师既能阐释传统的深层语法,又能引导学生在外来文化冲击中保持主体性。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启蒙辩证法”,为此提供方法论参照——在文化碰撞中实现反思性认同。

总结:

中美道德教育模式的差异,本质是文化传统与现代性诉求的辩证体现。中国模式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成效显著,但需警惕权威依赖对个体道德主体性的压制;美国模式虽激发批判思维,却可能削弱价值整合效能。中美学校道德教育的文化根基与实践路径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两国在育人理念与方法论层面的其实仍然存在深层互动关系。在全球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道德教育需超越单一文化框架,构建兼容并蓄的伦理对话机制。中国传统教育的集体导向与美国个体本位的平衡点在于:前者可借鉴隐性教育与自主探究策略以增强教育亲和力,后者需重视社会共识培育以缓解价值分裂危机。随着AI时代的来临,应进一步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下的道德教育新范式,通过智能算法与人文关怀的协同创新,建立动态化伦理评估体系,开发融合东方德性伦理与西方权利伦理的课程资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良性发展提供教育支持。

【参考文献】

-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至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
 - [3]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4]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6]崔健.国际化视野中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 [7]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 [8]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9]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 [10]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11][美]约翰·富兰克林·博比特.课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 [1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 [13][美]毛里奇奥·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14]曹金龙.美国社会爱国主义的群体考察[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3):40-48.
 - [15]戴韶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爱国主义教育的演进[J].思想理论教育,2014(4):22-26.
 - [16]邱柏生.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面临的若干挑战[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1):50-55.
 - [17]雷娜.网络爱国主义研究[D].北京: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
 - [18]王艳秋.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论[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2007.
 - [19]赵华掇.新时代中国爱国主义及其实践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
- 作者简介:陈慧(1987.3-),男,汉族,云南泸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